

宁波、泉州、广州发掘、宣传、展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现状及北海应作的工作

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考察组

近些年，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以下简称“海丝”）^①的研讨和争论引起很大关注。

“为什么全国有那么多的城市都举证自己城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申办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工作为什么越来越热？”

“如何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保护和宣传？”

带着许多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2004年4月中下旬，广西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派出史瑶、符丽明、姜家凤、沈雪岩四同志组成考察组到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泉州市、广东省广州市进行了有关海丝的调研考察。考察重在更准确地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实，为此走访了三地的市志办、文物局、文物处有关海丝方面的专家、学者，听取他们对海丝研究及海丝遗迹保护的介绍，参观了当地博物院、海交馆及与海丝相关的文化遗迹10多处。通过考察，我们对三省三地如何开发、保护海丝文化遗迹的工作有了了解，弥补了此前对海丝认识的不足。

一、宁波、泉州、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

1. 关于海丝的形成及发展

海丝，是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探索和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最早是汉武帝时开通了南海与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航线。公元二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直达航线也开通了。历经各代、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海丝空前繁荣，其范围已包括向东航行至朝鲜和日本，向南、向西航行至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岸、地中海以北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海上航线。

随着海上交通的开拓，中国沿海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诸多港口，宁波、泉州、广州就是其中代表。它们在唐宋时期，与扬州同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到了元代，泉州港的地位超过广州港，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港口的发展，促进了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古代欧洲、非洲、波斯、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各种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兼容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海丝文化遗存。我们看到，这些遗存虽然饱经沧桑，但大多保存完好，在数量和完整性方面都是少见的，有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它们为现存的或为一种消逝的文明提供了见证。这些遗迹在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有寺院、建筑、遗址、沉船、碑刻等，内容涉及商贸、交通、宗教、文化、艺术等十多个领域。

2. 与海丝有关的遗址、文物

不可移动的遗址及富有海丝文化气质的文物是海丝史迹的重要物证。我们在考察中就此进行重点追寻。

宁波与海丝有关的遗迹有：古代对外政治中心实物——鼓楼，接待高丽使节、商旅的遗址——高丽使馆遗址，“海上陶瓷之路”的发祥地——上林湖越窑遗址，专事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务）遗址，与阿拉伯世界交往见证——波斯巷遗址，中日海上交通见证——日本遣唐使入明州登陆地遗址，对外贸易重要交通物证——招宝山造船场及明州港第一石头、明州港海运码头旧址、四明驿及天封塔，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圣地——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禅寺，天宁寺塔，宝云寺遗址，延庆寺，清真寺，明州公庠，佛画坊、画肆遗址等。

泉州与海丝有关的遗迹较多，其中直接与海丝相关的有：位于市区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位于海口的石湖码头、姑嫂塔、六胜塔，位于江口的美山渡、文兴渡、圣殿渡、溜石塔、珂厝塔、真武庙、昭惠庙、天妃庙、水仙宫，位于城南的富美渡、聚宝街、万寿路、天后宫；有与海丝可谓千丝万缕联系的——开元寺、洛阳桥、万安渡、蔡襄祠、安平桥、石笋、老君岩像、西资岩和南天寺石刻造像、陈埭丁氏祠堂及民居建筑群、延福寺、涂门水关、王审邦墓等。这些遗址既有巍峨的地面建筑府文庙、开元寺东西塔、崇福寺、承天寺等，亦有埋没于地下的德济门遗址、乌屿码头遗址和遍布泉州各市、县的 530 多处外销瓷窑址，还有不少至今仍被视为珍品的出土文物——古船和回填埋于法石江畔的宋代

海船及 200 多方宗教石刻等。

广州与海丝有关的遗址、遗物有：光孝寺、西来初地、六榕寺、海幢寺、南海神庙、怀圣寺与光塔、清真先贤古墓、长洲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外国人墓地、柯拜船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银盒和铜熏炉等。

3. 海丝遗址情况简介

为有利于史学工作者研究，也方便专家考证，我们对上述海丝遗址按城市分布一一做了归纳，对其历史蕴含也做了初步记略。

分布在宁波的遗址

高丽使馆遗址——北宋朝廷指定接待高丽使节，商旅的遗址。位于市区月湖东岸、镇明路宝奎巷口一带，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自北宋熙宁七年(1074)，明州成为朝廷指定通往高丽的主要出入口岸后，为接待高丽蕃使，政和七年(1117)创建高丽使馆，又称高丽行使馆。该遗址是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友好交往的物证。

上林湖越窑遗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栲栳山北麓，是一个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窑群遗址区。唐时上林湖作为越窑的中心产地，所烧的青瓷通过海路运销亚非各国，该遗址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发祥地。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南部）遗址、菲律宾、泰国南部林民波遗址都出土了唐越窑青瓷。

市舶司（务）遗址——该遗址由市舶务（库）和来远（来安）亭两部分组成，前者位于市东渡路世贸大厦一带，占地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后者位于江夏公园一带。宋、元、明朝代，朝廷在明州设立市舶司（务），专事海外贸易管理。该遗址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入舶货的历史见证。

波斯巷遗址——位于天一广场内。宋代，随着与东南亚、西亚等国交往的频繁，众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来明州从事贸易与文化交流，其中有不少长期寓居明州。为此，明州特地在于市舶司西首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波斯馆用以专门接待，后称之为“波斯巷”，是唐宋时期宁波与阿拉伯世界交往的见证。

天封塔——位于海曙区大沙泥街西端，塔高 51.5 米，始建于唐天册万岁、万岁登封(695~696)年间，重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是古代明州港的航标。

日本遣唐使入明州登陆地遗址——该遗址在明州有两处，分别位于鄞州区鄞江桥镇及三江口一带。日本自630年起至894年间，先后派出20批遣唐使赴大唐学习先进的政制法令、宗教文化及社会习俗，其中有多次在明州登岸入境。第一、二次在明州鄞江桥镇上岸，第三次则在三江口一带停靠，遣唐使节随船带来大量物品，经明州州政府申报朝廷获批准后，一小部分人员进京“朝贡”，其余皆民间就地“实物互易”。该遗址是古代中日海上交通的重要口岸。

招宝山造船场及明州港第一码头遗址——位于镇海区招宝山下的甬江口北岸。北宋时，明州成为全国十一处官营造船场之一，同时，又是朝廷指定打造专供遣使出国大海船定点造船场。两次出使高丽的“神舟”均造于此。因地处甬江口，招宝山造船场自唐代起成为明州港第一停靠码头，各国使节、商旅船舶多由此启航放洋或经此入明州内港。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高僧阿倍仲麻吕就是在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由此启航归国的。

明州（庆元）港海运码头旧址——位于三江口沿岸一带。唐代起，不仅各国使节、商旅来明州船只均泊于此，而且自明州港出航的使节船、商船亦多由此下碇。唐宋元时期，这里是名闻遐迩的国际海运码头，是宁波沟通亚非的枢纽。

四明驿——位于柳汀街陆殿桥堍，现为佛教居士林址。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初为家祠，元泰定四年（1327年）改为驿站。明洪武元年（1368年），罢马站，设水站，命名“四明驿”。它是明代日本勘合贸易船赴京进贡的起程站和返国补充水源的基地，是日本遣明使入明必经之处。

五磊寺——位于慈溪市中南部五磊山象王峰南麓，占地面积约32000平方米，始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为印度高僧那罗延创建，它是最早由印度高僧创建的寺院。

阿育王寺——位于鄞州区五乡镇育王山西麓，全寺占地面积124100平方米，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赐为“阿育王寺”。唐代著名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曾在此讲学；宋时，日本高僧重源为学习唐式建筑，自乾道四年（1168年）起二次入明州，并从日本运大批木材帮助营筑阿育王

寺舍利殿。阿育王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天童禅寺——位于鄞州区东乡太白山麓，占地面积 76400 平方米。号称“东南佛国”，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 年），迁址重建于唐至德二年（757 年），现存建筑系明、清时重修重建。天童禅寺与日本关系密切，是古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圣地。

清真寺——位于海曙区月湖西岸后营巷，占地面积约 700 平方米，宋咸平年间（998~1003 年）建清真寺于城东南狮子桥旁。元至元年间（1264~1294 年）又迁建于海运公所南冲虚观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清真寺重建于现址，它是伊斯兰文化在宁波传播的象征。

明州公库——位于海曙区鼓楼步行街一带，为南宋明州官府刻书坊所在地，亦称明州公使库，所刻印的文集、诗集相当部分传播到日本、高丽，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画坊、画肆遗址——位于海曙区东轿街、石板巷一带。南宋明州佛教文化非常繁盛，涌现了一批专门以绘制佛像为题材的民间职业画家群体，他们在东轿街、石板巷一带开设画坊、画肆，向海外僧人与商贾专营佛画。这些佛画作品通过海路传往日本等国，并对日本镰仓时代绘画艺术产生了影响。

分布在泉州的遗址

开元寺——位于鲤城区，建于唐垂拱二年（686 年），占地面积 7.8 万平方米。该寺不但有佛教的雕像与殿堂，而且有古埃及神话、印度婆罗门教神话的雕刻，还有古希腊哥林多式的石柱，反映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兼容并存。在开元寺两侧，凌空矗立东西两塔，它们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宋代古塔，也是泉州古城的标志。

九日山摩崖石刻——位于晋江下游北岸，山有东西两峰，在两峰的摩崖上留有许多古人的题名留字石刻，其中有十一段为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提举市舶司共同为当时航行于南海和中国港湾之间的番舶祈求信风，并预祝他们的船舶能“满载而归，顺风抵达”而举行的“祈风典礼”的纪念题字。九日山摩崖石刻是当时泉州与海外贸易重要物证。

清净寺——位于涂门街中段，又称“艾苏哈卜大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史迹之一。

清净寺是古代中外通商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见证。

天后宫——位于市区南门天后路，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妈祖庙。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初名“顺济宫”，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改名“天后宫”，沿称至今。自建宫时起，泉州地方长官每逢妈祖生忌日，以及重大的海事活动都要前往祭拜，祈求海神保佑船舶平安。天后宫是泉州海外交通繁荣的有力物证。

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位于晋江华表山南麓，始建于宋绍兴年间，初为草构，故名“草庵”，元代改为石构仿木建筑。在草庵正厅内依崖壁雕刻了一尊摩尼光佛坐像，坐像镌刻于1339年，高1.52米，宽0.88米。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是国内外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是研究世界宗教史和海外交通史的重要实物依据。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丝考察团的总领队迪安博士称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是海丝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和最大成就”。

老君岩造像——位于市区北郊清源山上。高5米多，厚6米多，宽8米许，这尊老君坐像是用一块天然巨岩雕刻而成，堪称我国宋代道教石刻中罕见的瑰宝。

洛阳桥——位于市区东郊十公里的洛阳江上，是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于1053年发动万千工匠，花费七年时间，一万四千两银钱，在“水阔五里”的洛阳江上建成的，是宋代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

伊斯兰教圣墓——位于城东仁风门外灵山上，元至元二年（1336年）重修。“圣墓”所葬相传为穆罕默德当时的两个门徒——中国尊之为“三贤”与“四贤”。唐武德年间二人来中国泉州传教，死后葬于灵山。伊斯兰教圣墓在伊斯兰世界中，被认为是除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城里的先知穆罕默德圣墓和伊拉克纳杰夫城的阿里圣墓外，现存最古最完好的第三圣迹。

姑嫂塔和六胜塔——前者位于石狮宝盖山上，原名“关锁塔”，又称“万寿

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9~1162年），是海上船舶出入的重要标志。六胜塔地处泉州湾，建于宋代政和年间（1111~1117年），又名石湖塔，海上航行以此为导航标志。这两座塔向世人见证了海丝在泉州曾有过的辉煌历史。

分布在广州的遗址

光孝寺——位于光孝路，寺址原为西汉南越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吴国学者虞翻受贬居于此，称虞苑。后其家人将虞苑捐于佛门，创佛寺。东晋时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泛舶来华，于401年创建大殿，以后历代均有重修或重建。寺名也曾多次更换，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正式改为“报思广孝禅寺”，二十一年，又改“广”为“光”，由此形成光孝寺名称至今。光孝寺内保存不少历史古迹，如禅宗初祖达摩大师开凿的洗钵泉，惠能大师的“瘞发塔”等。光孝寺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西来初地——位于荔湾区下九路。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年），菩提达摩从天竺坐船到广州，在今荔湾区登陆，创建西来庵（即华林寺），后人为纪念佛教禅宗始祖达摩西来传经，便将达摩在广州的登陆处称为“西来初地”，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六榕寺——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420~479年），初名宝庄严寺，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重修，称净慧寺。后因苏轼来游，手题“六榕”而得今名，寺内有塔一座，名花塔，又称“六榕塔”，此塔在当时除了供奉从海外迎来的佛骨（舍利）外，还起着导航标的作用。六榕寺现为广州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南海神庙——位于黄埔区南岗镇庙头村。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以后历代均有扩建、重葺；兼之唐、宋、元诸代帝王不断加封南海神以及派遣多批高级官员南下致祭，因而在南海神庙中留下丰富碑刻。南海神庙由一系列建筑组成，包括大殿、拜亭、石坊、碑亭、华表、头门、仪门、后殿、浴日亭等，南海神庙是广州海外贸易兴盛的见证。

怀圣寺——位于光塔路，俗称光塔寺，占地面积2966平方米，寺名“怀圣”，系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相传系宛葛素于唐初创建，此后

在元、明、民国均重建，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之一。

光塔——位于怀圣寺内，又名怀圣塔，是为纪念“至圣”穆罕默德而建。光塔建立年代尚无定论，一说建于唐代，一说建于北宋。光塔现为国内孤例的伊斯兰教塔。光塔在古代除了“宣礼”外，兼有导航灯塔与气象观测站的职能。光塔与怀圣寺一样，是广州海上贸易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友谊的象征。

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又称巴斯教徒墓地。位于黄埔区长洲岛巴斯山，系鸦片战争前后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印度孟买商人的墓地。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又称（火）祆教，古代流行于伊朗、中亚等地，后逐渐向中国等地传布，墓地占地 100 多平方米。该墓地的存在是研究清代中国印度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清真先贤古墓——位于桂花岗解放北路兰圃西侧，又称回回坟、响坟，相传伊斯兰教早期著名人物赛义德·本·阿布·宛葛素在广州去世后，教徒将他葬于此。还有一说，认为先贤墓埋葬者系 9 世纪“最著名之回教人”伟伯。该古墓是古代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见证。

二、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

宁波、泉州、广州成为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固然与三地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政治因素、对外政策及造船、航海技术分不开，但同时也有不少人物从不同角度促进了三地与外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他们是朱之瑜、蒲寿庚、蓝祥、汪大猷、颜师鲁、真德秀、赵汝适、汪大渊、朱应、康泰、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拘那罗陀、菩提达摩、常骏、王君政、义净、杨廷璧、阿布·宛葛素、伍秉鉴、潘仕成等，现择若干介绍如下：

朱之瑜——（1600~1680 年）浙江余姚人，号舜水，明末著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清兵入关时与郑成功、张煌言举旗抗清复明，失败后游历海外，先到安南，1659 年后定居日本，先后在长崎、江户（东京）讲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被日本学术界奉为一代宗师。

蒲寿庚——宋元之际我国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号海云，祖先为阿拉伯

人，因经商到占城居住，后到广州定居，从事香料贸易。南宋时，其父由广州迁居泉州。蒲寿庚经营海外贸易，宋末任提举市舶三十年。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汪大渊——元代江西人，字焕章，20岁到泉州。此后从泉州港浮海远航，前后两下东西洋，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记其山川、习俗、物产和贸易诸情况。回泉州后，根据其海外经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

朱应——三国吴人，中国早期海外旅行家之一，约在吴黄武五年（226年）奉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与康泰赴扶南等国从事外交活动。归国后撰有《扶南异物志》。

康泰——三国吴人，中国早期海外旅行家之一，约在吴黄武五年（226年）和朱应出使扶南等国，并曾在扶南会见天竺使臣。归国后撰有《吴时外国传》。

昙摩耶舍——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东晋时泛舶来华，安帝隆安五年（401年）至广州，创立了王园寺，后来改名光孝寺，为岭南佛教发展作出贡献。

求那罗跋陀——梵僧。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到光孝寺，建毗节殿和戒坛。对光孝寺、岭南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菩提达摩——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天竺高僧。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萧梁普通七年（526年）秋泛舟达广州，建“西来庵”（即后来的华林寺）传教。还到光孝寺传教，并留下达摩井等遗迹。

拘那罗陀——西天竺人，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广州，以后又曾北上，并于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飘还广州”，驻光孝寺，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圆寂，在粤居住12年以上，所译佛经多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岭南、广州佛教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三、宁波、泉州、广州怎样发掘、展示、宣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

作为中华海洋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海丝一直是特殊的篇章。宁波、泉州、广

州作为古代海丝的重要港口，书写过光辉的一页。认真研究海丝历史，发掘好中华古国这一宝贵资源一直是这三个城市重塑形象，拓展城市文化底蕴的重点。在具体做法上三地有共同之处，也各有特色。

共同之处是：

一、成立专门机构领导海丝工作。其中宁波、泉州成立了海丝工作领导小组，市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海丝办公室，具体管理运作与海丝有关的事务。广州由文化局管理。

二、围绕海丝广泛开展学术研究。三地都把海丝列入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与海丝相关的书籍，如宁波印制了《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千年海外寻珍》、《浙东文化》专辑；泉州编辑出版《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辑论文集和《蓝色丝路漫记》；广州出版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广州海洋文明遗迹与文物》、《广州外洋行商人》、《黄埔村与古黄埔港》、《东南亚华侨与广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南海神庙》、《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丛编》（第一辑）等。

不同之处是：宁波、泉州在 2001 年确定以海丝遗迹为主，开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州没有参与。该市把海丝列入广东省“四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荟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社科课题。

宁波、泉州在开展申遗工作中，又各具特色。

宁波确立海丝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后，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的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向全市发出《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引起全市人民重视。组织全市文物部门专家对全市现有的 225 处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进行了梳理，精选出 30 处与海丝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文保单位（点）或文物遗产，并对它们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深入研究，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报工作的通知》人选原则，精选出 19 处遗存作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的申报名单，经浙江省文物局审定并报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后，已于2003年10月上报国家文物局。为呼应此项工作，从2001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纪念活动。2003年，还开展了“千年海外寻珍”行动，组织由专家、新闻记者和市民代表参与的团队到日本、韩国调查，寻访与宁波海丝有关的文化遗存，以此作为申遗工作的配套项目。宁波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在规范有序地推进。

泉州在申遗中，把保护放在首位。福建省、泉州市分别成立了海丝工作领导小组，政府下发了相关文件。泉州市在海丝办设有5个职能小组（综合秘书组、文本编写组、规划测试组、宣传展览组、拆迁整治组）具体负责海丝文化遗迹的规划、整治、保护工作。相继出台了《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把与海丝有关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严格置于政令、规划的制约和监督之下。第二，加大整治力度，优化环境，自2001年申遗以来，政府已投入2.2亿元对被列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的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以期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要求。第三，泉州市人民政府公开聘请了海内外14位知名专家、学者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顾问，指导、帮助申遗工作。第四，从文化遗存中确定16个点作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申报点及考察点，并做好编写海丝申报文化遗产文本及与之相关的录像工作，争取2005年或2006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四、北海如何深入发掘、宣传、展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史实

借鉴宁波、泉州、广州三市经验，北海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1. 营造海丝文化氛围

北海合浦有二千多年历史，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这一历史史实中，北海合浦享有独特的光荣，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有船可从合浦、徐闻入海、抵东南亚诸国的直接记载，表明了合浦在西汉时期就是通往东南亚诸国的港口，是海丝

最早的始发港之一。综合宁波、泉州、广州三市情况，我们认为，在始发港问题上，是不是“最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现有的历史遗址、文物、与海丝相关的实证发掘好、保护好、管理好。从北海市来讲，我们宣传、展示海丝工作相对滞后，当前要紧的是在全市营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海丝文化形象，围绕海丝提升城市素质。

海丝的核心是海，是海外贸易的连接延伸。海丝看起来是海洋贸易的通道，实质是传播海洋文化的链条。我市宣传海丝应立足不是为了拿个名份，挽回什么光荣，得到一个好的背倚，要紧的是通过这一历史的承载张扬城市的精髓，扩大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改革和对外开放。

2. 关注与海丝有关的文化元素

北海有众多与海丝密切相连的文化元素，我们应给以认真关注：

建筑文化的元素：建筑是凝固的城市形象，它背负着文化的底蕴。北海的西洋建筑群落实际上是海丝文化的必然产物，凝聚着建筑上的海派特点。在体现历史与今天、传统与现代等方面有相当的亲和力，挖掘北海建筑风格，对海丝的文化形象乃至城市的整体形象有直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市民文化的元素：应引导市民自觉把自己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对海丝，市民不是被组织而是主动地参与，自觉地选择投入城市的海丝活动和文化。没有这些元素，海丝就缺乏雄厚的民心基础。

时尚文化的元素：海丝城市不一定仅有历史文化，它一定还要有时尚文化。时尚是一种引领潮流的冲动，是海丝形象的旗帜，当年，东、西方国家千帆过海的盛景就曾引领了世界的时尚，在今天，时尚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我国 29 个被列入世遗名单上的城市和景点都有时尚的品样。北海在 100 多年前就曾以对外开放口岸的姿容引起世人关注，具有良好的潜质，相信挖掘出与众不同的文化典藏，北海必将树立起时尚与海丝之都的形象。

生态文化的元素：21 世纪是重视生态、环保的时代。海丝的生态环境需要先进的文化理念指导，人工环境的文化形象已经落伍了，不去干预或者极少干预的

生态环境才是新世纪的生态文化形象。北海的海丝工作应从各个角度维护与海丝有关的生态环境的完整，不能人为的损坏海丝遗址的原生态。缺少原生态文化形象是缺乏美誉度的，其海丝城市的根基也立不稳。

3. 整理、保护、展示海丝遗址

我市的海丝遗址，见证了人类文明延续和进步的自然历史，也见证了我们的先祖先民为延续文明和维护进步而进行的努力。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在感情上，我们必须对我市的海丝历史抱有极大的温情和敬意。胜地美景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颁布的《世界遗产公约》^②要求各国对世界遗产进行妥善的保护和展示。本着这一原则，根据我市海丝工作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要保护，先要整理

我们建议，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组织专门人员整理我市海丝遗产家底，查清与海丝有联系的遗址有哪些，哪些属于我市特有实证，哪些是佐证，哪些人物、事物、民间文艺与海丝有关，做到心中有数。

要展示，也要保护

政府要适时颁布政令，保护遗址周边的生态；要对海丝的文物景点和人文景观作出明确标志；对海丝文化遗产应建立保护监测制度；对海丝文物、古迹进行维护和修缮时，应当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污损、刻划或者损坏海丝遗址；继承保护和弘扬与海丝遗址有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在遗址地缘外及早设立保护区，根据需要设置北海海丝遗产陈列室，出版、展示、宣传北海海丝历史文化作品等。在所有工作中，保护是第一位的。如果保护和旅游发生冲突，必须牺牲旅游。守住我们的遗址，就是守住历史、守住根脉。

要展示，更要研究

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至少包括科学研究、教育、旅游、启智和创作、体验等功能。我市应抓紧设立海丝文化保护区，保护区分为区内区外，从而解决旅游服务和科学研究保护这一分工。对海丝遗产的研究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因为没有

研究就根本无法认识这些遗址的价值。学术研究要着眼实际，为更理性地保护我市海丝遗存提供理论根据。从目前看，我市虽有散见在报刊、书籍的一些海丝方面的文章，但没有一本有深度的海丝论文集出版，这方面工作需要抓紧进行。

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市单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条件不甚成熟，可学习梁祝故事发源地联合申遗的做法。^③

外地围绕海丝工作，成立专门机构、拨出专款、政府下发文件、制定海丝遗产保护的整体规划等成功做法的经验，我市应借鉴学习。

（符丽明等执笔）

注释：

①“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地理学家希特霍芬提出来的，原指古代中国经过中亚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线。这个概念具体而又生动，很快为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与认同。随着时间推移，丝绸之路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其内涵也不断丰富，通过研究，证明除了陆路之外，在古代还存在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线，专家学者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泛指全球东西方通过海洋进行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的定义有三条：一、文物：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部件和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组合体。二、建筑群：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建筑形式、统一性及其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体。三、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结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的地区。

③浙江省鄞州区、杭州市、上虞市，江苏宜兴市，山东济宁市和河南驻马店市等四省六地的“祝梁”申遗代表达成“联合申遗”的共识。

主要参考书目：

- ①宁波文化局编印《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
- ②陈瑞统著《蓝色丝路漫记》
- ③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第一、二辑
- ④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 ⑤文汇报《现代城市发展战略》2004.6.7
- ⑥人民日报《守护王冠上的明珠》2004.6.11
- ⑦光明日报《梁祝故事发源地之争戏剧性结局》2004.6.20